

周恩来 军事理论与实践

ZHOENLAIJUNSHILILUNYUSHIJIAN

张家裕◎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周恩来军事理论与实践

张家裕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恩来军事理论与实践 / 张家裕著.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073-4559-9

I. ①周… II. ①张… III. ①周恩来(1898-1976)
—军事思想—研究 IV. ①E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1981号

周恩来军事理论与实践

著 者: 张家裕

责任编辑: 张文和 杨 平

封面设计: 陈丰林

出版发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1号

邮 编: 100017

网 址: www.zywxpress.com

电子邮箱: zywx5073@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中献唐人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680×960mm 16开 22.75印张 300千字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73-4559-9 定价: 55.00元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序 言

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他在中国共产党军事史上的巨大贡献及其显赫地位，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公认。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曾两次率领黄埔校军参加东征作战。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他组织和领导了“八一”南昌武装起义；在担负党中央军事方面的领导工作中，又先后指导了全国各地工农武装起义和创建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断壮大武装力量。1931 年底，他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后，直接指挥红军作战，并取得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4 年底，由于党中央错误路线的指导，使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连遭失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后，他又和毛泽东组织和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恩来又先后参与中共中央制定全民族全面持久抗日的战略方针，组织和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出师敌后，在华北、华中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并在领导和开展军事统战工作中取得显著成效。他还积极领导中共南方局开辟华

南敌后根据地，发展武装力量，长期坚持游击战争。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应蒋介石之邀，他陪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达成了“双十”协定。1946年6月，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和平协定，挑起内战，向解放区大举发动军事进攻。周恩来率中共谈判代表团从南京回到延安。从此，他便积极协助毛泽东领导和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参与了中央军委所有重大决策，赢得了解放全国大陆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又协助毛泽东积极组织和领导国防建设和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在保卫国防，抗击外敌入侵的军事斗争中，他先后参与决策和指挥了抗美援朝战争，炮击金门，中印、中苏边境反击战及西沙反击作战等，均取得了辉煌胜利，捍卫了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周恩来在领导中国革命军事斗争中的伟大贡献令中国人民敬佩，他光辉的军事思想永远值得全党全军继承和学习。

1978年笔者从部队调到军事科学院后主要担任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军事斗争的指导理论。研究工作使我深刻体会到，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斗争史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共同的革命理想、奋斗目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路线相一致的基础上，无论是在探索中国武装革命道路和领导人民军队建军、作战的发展史上，也无论是在军事实践的指导和军事理论的创造等主要方面，都融进了他俩共同的革命精神和智慧才华，可谓密不可分。因而使我在研究工作中，对周恩来的军事生涯、军事思想和谋略艺术产生了极大兴趣，并作了一些探讨。曾先后在一些理论研讨会和书刊上发表了有关周恩来军事传略和军事理论与

实践方面的文章，并在退休之后利用闲暇时间有计划、有目的地继续进行研究。至目前为止，先后所发表的文章，已能较完整、系统、全面地反映出周恩来军事领域里重点是军事思想方面的基本内容。终于使我实现了将它们集结成册出本书的愿望，并将书名定为《周恩来军事理论与实践》，在纪念周恩来诞辰 119 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之际，作为献给这位开国总理、伟大的军事家的缅怀作品。为宣传周恩来的军事伟业和军事理论做点益事，同时也为周恩来军事领域的研究工作填补不足。

作为一名军事理论研究者，虽说在周恩来军事领域中断续地探索了近 30 年，也下了一些功夫，但因学识水平有限，加上退休后学术信息不灵，定难免避免错误和不足。敬请专家、读者指正。

作 者

2017 年 1 月

>>>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军事家周恩来	1
第二章 军事历史地位	25
第三章 领导南昌起义及经验教训	42
第四章 军事思想及基本理论体系	53
第五章 论《周选》中的军事思想	72
第六章 军事方法论	88
第七章 建军思想及现实意义	106
第八章 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119
第九章 游击战争的理论与实践	130
第十章 论人民战争及战役战术思想	140
第十一章 作战指导的基本原则与艺术	162
第十二章 军事战略的科学预见	179
第十三章 军事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192
第十四章 军事后勤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204
第十五章 军事统战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216
第十六章 军事外交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229

第十七章 抗战时期的国防思想与谋略	242
第十八章 加强新中国国防的基本依据	254
第十九章 加强国防的指导路线	262
第二十章 国防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279
第二十一章 国防经济及“四个现代化”理论	292
第二十二章 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311
第二十三章 反霸与不称霸的基本国策	324
第二十四章 毛泽东、周恩来的核战略方针	334
附录：周恩来军事著作（部分）释文	345
后记	353

第一章 军事家周恩来

周恩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夺取全国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丰功伟绩。他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领导工作，直接参与中央各个战争时期重大的战略决策，正确贯彻党的战略方针，成为毛泽东实施战争指导的得力助手。他多谋略、细筹划，善于准确细致、及时高效科学地领导统帅机关的组织指挥工作，被誉为人民军队优秀的总参谋长。他以自己的天才和智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参与创办黄埔军校，开创革命军队政治工作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淮安县。原籍浙江省绍兴市。少年时即追求革命。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传到日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初回国，五四运动中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全力参加运动，钻研新思潮，探索中国革命道路。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与赵世炎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中共旅欧组织领导人。经过艰苦探索，周恩来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经过长期的、流血的武装斗争，才能使政权为劳动阶级所掌握，中国社会才能得到真正改造。强调在中国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必须建立革命的军队。他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从

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懂得武装斗争和军事工作重要性的领导人。

1924年9月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后，到达国共合作后的广东政府所在地——广州。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必须建立一支能为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纲领而奋斗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必须能影响和推动旧军队的革新和改造，以完成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同年10月，任重新建立的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参加平定商团叛乱的临时军事指挥工作，积极支持孙中山北上主张。12月主持组建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即叶挺独立团的前身）。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以黄埔军校中一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为核心，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创办进步刊物，建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按照列宁创建红军的经验，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加强对军校学生的政治教育，团结教育广大师生，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开展政治工作，使黄埔军校政治部的工作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战斗性。1925年2月，军阀陈炯明发动叛乱，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同校长蒋介石等率黄埔军校校军参加东征。在东征中，他极重视用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中，启发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他在《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中指出：中国革命，须有真正之革命军，须有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强调“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人民武力一切军事行动的根本目的是“解除人民痛苦”、“增加人民幸福”，阐明了人民与革命军的关系并广泛发动群众配合东征部队的军事行动。他在题为《军队中政治工作》的讲演中，对军队的阶级性质、作用进行了充分论述。指出：阶级分为压迫与被压迫阶级，凡压迫阶级都是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军队是一种工具，“压迫者拿这工具去压迫人”，被压迫阶级觉悟的时候“也可利用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同年7月1日，在黄埔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革命军人自觉遵守纪律的重要性。指出：这是革命军队与旧军队的根本区别之一。但这种纪律“并不是强迫的，是各同志甘心愿意遵守的。”后在国民

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上作《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政治工作的必要性，政治工作的目的、任务和方法。他指出，军事政治工作，要以军队为背景。“革命军队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

“是革命的灵魂”，其目的就是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强调“军队中的士兵都是被压迫阶级的工农”，“一定要遵照党的政策，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制度”。并提出了要发挥政治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指出：“我们在军队里做政治工作，要以身作则，严守纪律，常常表示勇敢的态度，比士兵更要勤苦”。只有这样，“才能鼓起士兵们作战的勇气”，“巩固革命的基础”。10月，周恩来继又参与指挥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任第1军政治部主任、第1军第1师党代表、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全权负责前方政治工作。东征过程中，亲自参与指挥惠州战役，组织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敢死队，攻克了惠州城，尔后又指挥部队相继攻占海丰和收复汕头等作战。这个时期，周恩来所从事的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是对列宁政治建军原则在中国条件下的创造性探索，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

东征胜利结束后，周恩来指导组建以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由共产党员叶挺、周士第分任团长和参谋长。团设党支部，连有党小组。党支部由广东区委军事部直接领导，成为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1926年2月1日，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副党代表。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与毛泽东等主张军事反击。为了加强北伐军中党的政治工作，周恩来以中山大学国民党特别党部名义，办了一期军队政治干部训练班。结业后，他将“中山舰事件”后被迫离开第1军的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大部派往叶挺独立团。5至7月，在广州以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身份，主持共产党员参加北伐的准备工作，并对担任北伐先锋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连以上党员干部讲话，号召大家英勇作

战，不怕牺牲，要起先锋模范作用。继而又主持召开国民革命军第1、2、3、4、6军中和黄埔军校本部的共产党员参加北伐的组织准备和动员工作会议，部署各项工作，积极为北伐战争作准备。

周恩来在大革命期间参与革命军队的领导和建设工作积累的宝贵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独立进行革命战争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人民解放军后来形成的各种制度也是继承了那时的光荣传统进而加以发扬，毛泽东曾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并高度赞扬“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

1926年12月，周恩来离广东赴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中央和上海区联合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委员，特别军委书记。3月与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及时起草致中共中央的意见书，与赵世炎、罗亦农等共同建议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5月，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列席中央常委会。这时，国共两党合作即将全面破裂，周恩来主张在农民运动力量强大的湖南农村发动武装暴动，提出在暴动中进攻反动势力薄弱的城池等意见。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他任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领导南昌起义，致力武装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为了挽救中国革命，于1927年7月中

旬作出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随后周恩来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一起于8月1日凌晨，领导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当晚，周恩来即主持参谋团委员会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立即南下，占领广东的预定方针，会议决定从南昌出发经赣东寻乌直取东江。起义军各部经初步整编后分批撤离南昌。5日，周恩来在向中共中央写信报告南昌起义情况后，亦率起义军离南昌南下。途中，在瑞金、会昌地区击破国民党军钱大钧、黄绍竑等部的拦阻，于9月由福建进入广东。在三河坝分兵一部由朱德、陈毅率领监视梅县方面之敌，掩护全军侧背，起义军主力南下潮汕，顺利攻占了潮州、汕头，但在敌重兵围攻下潮汕相继失手。9月下旬，起义军在西进途中于揭阳白石和普宁流沙地区与国民党军激战，周恩来此时身染重病，但仍与贺龙、叶挺等指挥部队奋勇还击，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10月中旬，周恩来被送往香港治病。

后来，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时指出：“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

1927年11月上旬，周恩来自香港转赴上海，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增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继又出席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仍主管军事工作，负责指导各地武装斗争的开展。这时，周恩来在总结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之后，对武装暴动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反对盲动主义，必须与工农暴动相结合，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同年12月，在他起草的《中共致福建临委信》中指出：“暴动这个名词必须用在群众斗争发展到最高点，是以武装形式推翻统治阶级政权这一意义上”。并指出：“工人农民非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不能称之为武装暴动”。同一时期，在周恩来起草的给湖北、江苏、

浙江等省委的信中，要求认真纠正“无动不暴”、“认为凡是斗争就是暴动”的错误思想。他还强调，各地党组织在决定一个地区的暴动时，必须具备相当的主客观条件，决不能贸然行动。他在起草《中共致云南临委信》中指出：“暴动的发动是要在工农群众继续不断的斗争中才能产生，暴动的时期也要依照环境情形、斗争程度、革命的情绪组织力量如何而定”，反对不顾条件，主观主义地决定暴动。在指导全国武装暴动时，周恩来还强调既要发动群众，又要掌握革命武装，同时要避免发生只依靠军事力量而不发动群众的倾向。在他起草的中共给广东省委、浙江省委信中均强调：必须努力创造群众自己的武装工农革命军。发展革命武装，开展乡村游击战争。周恩来的这种武装暴动，建立武装，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政权，开展游击战争的意识，为全国各地创建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探索中国武装革命道路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928年6至7月间，周恩来在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在总结中共领导军事工作和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时，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为了联合战线而仅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始终没有尽力发展工人纠察队，没有将农村中的农军发展起来，来做夺取乡村政权的力量”。二是南昌起义失败后，“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和技术训练，都视之为军事投机。由那一极端直趋到这一极端，事实上将取消军事工作”。提出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工农，发动群众，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并指出了红军的建军原则是：改变雇佣性；军官要无产阶级化；一定要有政治工作。强调红军一定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否则就“失了红军的阶级基础”。这个军事报告为六大制定中国共产党“争取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总任务提供了重要依据。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后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10月初离莫斯科经沈阳，于11月上旬回

到上海。

主持中共军事工作，指导全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建设

六大以后，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秘密领导革命斗争。周恩来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负责联系和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革命工作，并负责中共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六大前后，中国农村的革命游击战争处于特别困难的时期。国民党军集中力量对各地工农红军进行“清剿”和“会剿”。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为坚持农村游击战争，发展壮大工农红军武装力量作了大量工作。他训练和派遣了大批军事干部支援各地红军和从事国民党部队的兵运工作，总结和交换各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经验，指导红军和根据地建设，并筹划和建立中央与各根据地红军的交通网。192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周恩来修改和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军事化的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开始实行有系统的军事政治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工作。接着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提出要红军分散到农村中去，强调红军目前的总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

3月，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目前所应注意的不是占领大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游击战争的发展，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明确提出武装斗争必须与土地革命相结合的思想。6月，他又在为中央起草给贺龙并湘鄂西前委的信中，介绍了朱毛红军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在内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指出，“这些经验很可以作你们参考”，从而促进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游击战争的发展。

随着农村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工农红军的壮大，中共中央主管军事

工作的周恩来，对各地红军的建军作战经常进行指导。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26年9月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的正确。信中明确提出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这一光辉思想，同时还对红军的任务、建设、党的领导和发展方向等作了规定。指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改革，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对红军建设提出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意识领导，建立党代表制度和兵委组织，加强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全面提高战斗力。并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党对军队的指挥应“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对红军的发展方向，提出：“应该向着群众有发展斗争可能的地方。对于敌军事力量空虚的地方或乡村中白色势力范围应实行游击”。12月下旬，红四军前委根据“九月来信”精神，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九月来信”所提出的有关红军的建军和发展的思想，对开好古田会议起了重要作用。

1930年3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周恩来离上海经欧洲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自中共六大以来的工作及红军的发展和建设等情况。8月，周恩来、瞿秋白分别由莫斯科回到上海，并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建立并发展革命根据地的问题。指出：“根据地决不是割据、保守，而是站住脚跟，一步一步的有力地发展”。在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他又强调指出：“现在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所以更要加强组织上的领导”。从而在引导

全党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发展红军这个根本性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会议作出决议，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纠正了立三路线“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9月底，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作《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红军的主要任务已不仅是发展游击战争，发展红军，而要更进一步强固红军，集中红军的领导来担当组织革命战争的任务。解决如何使红军成为工农政权的主要力量问题。强调在红军中只容许党在政治上为唯一领导，党要用集体领导的原则来建立最高权威，反对只注意发展而不注意巩固与加强的错误观念。并提出要有计划地创办军事政治学校培训红军干部。会后，中央军委制定了改编红军的计划，推动了红军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同年10月，蒋介石结束了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的中原混战，迅速调集兵力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围剿”。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红1、3军团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目前党之最中心的策略是如何组织革命战争来击破敌人的“围剿”与进攻。强调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统一指挥，利用敌人的弱点，尽力地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打击。1931年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周恩来为中央起草指示通报这一胜利，要求其他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中必须学习红一方面军的经验、“在适当的力量对比上，击破敌人的一方，给敌以各个击破”。同年8月，周恩来在听了中央苏区关于第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汇报后，再次指出：“现在中央苏区的中心任务应是：最大范围地发动群众，巩固并扩大红军支持长期的艰苦的阶级战争，以冲破敌人的‘围剿’，并扩大苏区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强调“在军事策略方面，集中红军主力，实行各个击破敌人，这是我们的原则”，并要求在作战方法上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些对指导各地红军贯彻正确的作战原则均起了重要作用。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周恩来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